

话说中国

百年记忆

卷七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三次长沙会战	(1)
空袭日本与浙赣战役	(10)
鄂西会战	(22)
常德会战	(32)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壮大	(42)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42)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46)
三、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	(51)
四、加强根据地建设,开展整风运动	(58)
五、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	(63)
台儿庄战役亲历记	(70)
我所经历的百团大战	(83)
狮垭山战斗	(83)
榆辽战役	(87)
关家垭战斗	(89)
战斗在敌后的最前线	(92)
重庆谈判	(96)
蒋介石在重庆摆下鸿门宴	(96)

毛泽东和蒋介石各自亮出谈判的底牌	(102)
蒋介石对毛泽东的一句“肺腑之言”	(108)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不断的穿梭访问	(111)
刘少奇勇担重任,闪电之势拿下了东北.....	(115)
国共和谈,美国扮演了一个十分奇怪的角色.....	(124)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战场之外的对比	(141)
美国对国民党“志大才疏”的进攻计划毫无信心	(157)

第三次长沙会战

确切地说，第三次长沙会战是日军香港作战的一个支战场，因为它本来是为阻止中国军队南下而进行的一次策应性行动，只是在中途才被扩大化，进而演变成一场在规模上远远超过香港作战的大战役。

日军在制定南方作战的计划之初，即怀有攻占香港的企图。因此，在1941年12月8日，与偷袭珍珠港几乎同时，以广州为中心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开始进攻香港。也就在此时，中国依照与英方的约定，从长沙附近调兵南下，向广州进逼。这立即引起日军的注意与惊惧，在12月13日，日本天皇曾就此事询问其参谋总长：“围绕进攻香港对于广州和九龙半岛方面，有无中国军队反攻的忧虑？”最后，日军决定由以汉口为中心的第十一军向南发动一次有限攻势，至于将进攻的最远点定在何处，在日军内部却说法不一，像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和所属第三师团的师团长丰岛房太郎都是好大喜功的人，他们根据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认为日军完全可以或应该直捣长沙，第三师团的士兵甚至在行动之前就放出了攻占长沙的风声；而第十一军的参谋长木下勇和参谋副长二见秋三郎则要现实一些，他们认为日军还缺乏攻占长沙的能力与信心。尽管

在12月15日，后一种意见获得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批准，但阿南惟几并未放弃己见。

第九战区首当其冲。还在1942年9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鉴于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教训，制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具体而言，就是在赣北、鄂南和湘西取守势，寸土必争，而“在湘北方面，则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反击而歼灭之。”后来，薛岳又形象地把这个作战方针概括为“天炉战法”，即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诱敌深入，待改进入决战地区，再从四面八方如天然熔炉般将其围歼。到12月中旬，第九战区发现日军第十一军先后从鄂南、鄂北和鄂西调兵向临湘和岳阳一带集结，南昌方面的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与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也开始向赣西的安义、西山和万寿宫集结，薛岳即判断日军第十一军有进攻湘北以策应香港作战的可能。12月18日，新墙河北岸的日军已经跃跃欲试，数次炮击南岸中国军队的阵地，两天之后，薛岳即下达作战命令，开始实施“天护战法”，其具体布置是：北部以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在新墙河为第一道防线，中部以第三十七军和第九十九军在泥水以南为第二道防线，西部以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守住湘赣边界，南部以第十军坚守长沙，另以卢汉的第一集团军、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以及第四、二十六、七十三、七十九和七十四军为第二线部队，待日军进攻长沙时，上述部队呈球心状在汨罗河与捞刀河之间将其围歼。

在湘北，有三条东西流向、几乎平行的大河都与洞庭

湖相连，它们由北向南依次是新墙河、汨罗江与捞刀河。1941年12月24日傍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先由第六和第四师团渡过新培河发起攻击，次日，第三师团也加入攻击行动。这时，在新墙河正面布防的是川军杨森的看家部队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军，该部自1938年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以来，就一直在湘北作战，尤其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二十军炸毁了日军设在岳阳大荆街的弹药库，迫使日军因粮弹不济而从长沙撤退，以致薛岳在战后当面恭维杨森：“新墙河只有二十军才能守得住。”按照薛岳“天炉战法”的计划，第二十军起码要在新墙河一线坚持10天以上，然后才可撤到稍南一点的关王桥三江口侧面阵地。但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第二十七集团军（辖第二十军与第五十八军）只坚持了两天，26日，三江口、关王桥两处阵地也失守，第二十军已处于日军的分割包围中。翌日，正当杨森开始组织第五十八军协同第二十军作战之际，接到薛岳的电话指示：“第二十军应向南移，左翼务截断陈家洞至花桥道路，勿使敌东窜，尔后向长乐街攻击。策第五十八军应速向南移，务与第二十军确取联络。”杨森当即命令两军一面逐次抵抗，一面向南转移。日军迅速扑至汨罗江一线。

这一年冬天湖南的气候也有点反常，连续几天的阴雨使汨罗江河水暴涨，本来在归义以东的河道，人马均可徒涉，但到12月下旬，河水已有1米多到3米之深，尤其是12月25日的一场大雪，气温一下降到摄氏零下4至5度，

双方都增加了一个新的敌人——寒冷、潮湿的气候。还在26日中午，日军的先头部队即已抵达汨罗江以北的青龙桥、冷水井和青石桥一线。在汨罗江以南担任阻击任务的是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军与陈沛的第三十七军，按照预定计划，第九十九军（三个师）必须确保西翼的三姐桥、骆公桥、归义、营田、湘阴等地以及洞庭湖南岸的湖防，待敌人进攻长沙时再以两个师的兵力由西北向东南夹击；第三十七军（三个师）必须在汨罗江以南的东翼阵地至少坚持半个月，才可撤至侧面的金井，然后与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汇合，由东北向西南夹击进攻长沙的敌人。但与第二十七集团军一样，第九十九军与第三十七军也未能完成原定的阻击任务。12月27日，日军第三师团主力即在归义附近强渡汨水，第六师团主力与第四〇师团主力也分别集结在新市和长乐街附近。同一天，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下令退据东翼的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全力攻击长乐街方面的日军，要第三十七军与第九十九军固守汨水南岸阵地。28日，日军第六和第四十师团强渡汨水时遭到第三十七军的阻击，未能得逞，但西翼的日军第三师团却成功地突破了第九十九军的防线，并开始向东迂回。按照日军的预定计划，这时第三师团与第六师团都应向东迂回，包围第三十七军。30日，日军第六和第四十师团终于在新市和长乐街突破第三十七军的防线，但正在第三十七军生死存亡之际，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日军第三师团不按原计划东进，而是径直向南，逼近长沙。

如上所述，在日军第十一军制定作战计划时，其司令官阿南惟几就有进攻长沙的意向，此时，他见日军作战顺利，便又动起了攻打长沙的心思，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香港虽已陷落，但敌人之攻势（向广东方面）于今后数日中，却仍然存在着很大危险。我军在此，对该方面的牵制，如果稍有松懈，就不能说是完成了军的任务，需要更坚强的决心。”其实，蒋介石已经开始从湘西、粤北和桂西调集第七十三、第四和第七十四军往长沙，根本无力再图广州，而香港在25日就沦入日军之手，照说第十一军牵制中国军队、策应香港作战的目的已经达到，这时再图长沙就有点画蛇添足了。阿南惟几一直想努力说服其参谋人员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而到29日，两个新情况促使他先斩后奏，进攻长沙。一件事是他得知了陆相东条英机在议会的讲话，东条英机认为中国军队在向广州移动的企图落空之后，“深感惭愧，期望进一步发动一场果敢的攻击”；另一件事就是他从空军的侦察报告获悉，中国军队“正向长沙方面退却”。当天，阿南惟几不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回音，自行决定，让与其看法相同的丰岛房太郎率第三师团向长沙方面追击。开始进展颇为顺利，第三师团的骄兵悍将也已着手准备在长沙庆祝元旦。对日，第三师团刚抵达长沙城南，丰岛房太郎即下令攻击，但这次与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情形不同，他们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

担负防守长沙重任的中国军队是李玉堂的第十军，在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因该军作战不力，李玉堂曾被革去军长之职，而在此次会战开始之前，薛岳应第十军将士之请，特让李玉堂暂代军长一职，促其一洗前耻。按照原定计划，第十军起码要在长沙坚守3天，等其他部队集结完毕，才可自西向东反击敌军。形象一点说，第十军就像一块引鱼上钩的诱饵，必须等鱼咬住钩后，其他部队才可出击。12月30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对此再作强调：“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我乘其攻击顿挫，集中全力，一举向敌围攻。”当晚，薛岳即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同时，为确保长沙万无一失，他又将彭位仁的第七十三军调至长沙，并在岳麓山上架起了15公分的重炮。对日，薛岳最后确定了攻击时间，令各部于1942年1月1日夜间开始攻击，1月4日，必须进入第一次攻击线，为表示自己“必死”和“必胜”的信念，他还跟下属约法三章，其中第二条就是：“薛岳如果战死，应立即由罗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引者）代行职务，按预定计划歼灭敌人。集团军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有战死者，即由副长官或经历较深的主任代行其职务。”

1942年的元旦，日军第三师团在长沙东南郊发起总攻击，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下午即突破了守军的第一道

防线，但在第二道防线，双方打成胶着状。翌日，一部分日军甚至进入了城内，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与其展开了逐房逐街的激烈巷战，终于将其击退，并从被击毙的日军大队长身上搜到作战计划和命令，薛岳由此得知日军粮弹不足、难以为继，不禁高兴得拍案大叫：“这一张薄纸，抵得上一万挺机关枪”，当即他就命人将文件印发各部。也就在这天傍晚，日军第六师团赶到，加入了对长沙的攻击。守军伤亡甚重，但依靠岳麓山上的榴弹炮与迫击炮的炮火支援，仍顽强地坚守着阵地。这时，日军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已经看出中国军队的包围企图，要求进攻长沙的日军北撤，但被拒绝。目空一切的阿南惟几还在军参谋部的黑板上写下两句汉涛：“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到1月3日下午，他还要求“再观察一下情况”之后，才能决定是否中止对长沙的进攻，但木下勇为首的参谋部坚持要在5号以前将部队撤回汨水一线。在这种情况下，阿南淮及才勉强在3日晚下令进攻长沙的日军在第二天日落之后北撤。但在这时，中国军队已经完成了对日军第三、六两师团的包围。

蒋介石对这次长沙会战期望颇大，1月4日，正值对日军的追击作战开始之际，他即电告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

“敌军此次用六个精锐师团夹攻长沙，志在必得，连攻昼夜，死伤实在五分之三以上，其余个晚向北溃窜；但仍为我军节节截击，其能生还者必无几何。经过此一胜

利，则华中之敌，较易收拾矣。”

可见，蒋已把日军第三、六师团视作手到擒拿的瓮中之鳖，以致作了极为乐观的估计。但情况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简单，日军尽管已是疲惫之师，但其士兵的作战素质仍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在陷入重围的情况之下，仍作困兽之斗。

1月4日下午6时，薛岳得知日军北撤，立即下令各部出击，其具体部署是：以罗卓英率第七十三、第四和第二十六军由南向北追，以杨森率第二十和第五十八军由北向南堵，以王陵基率第三十七和第七十八军由东向西拦，以傅卫芳率第九十九军主力由西向东截，力争将日军第三和第六师团歼灭于汨罗江以南与捞刀河以北地区。但命令未规定各部应抢占两条河的几个重要渡口，紧接着又丧失了两次绝好的战机，一次是在1月4日，日军北撤的第一天，第七十九军在长沙城东的郎梨市截住了日军第六师团的辎重联队，另一次是在1月5日，第二十六军在茶塘附近包围了日军第三师团的辎重联队，但都未能将其歼灭，致使本已弹尽粮绝的日军获得补充。1月7日，日军退到捞刀河以北，这时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两个军已在影珠山和福临铺一线严阵以待。8日，蒋介石也通过电话亲自下达命令：“以福临铺东侧的古华山为界，西面由杨森副司令长官负责，东面由王陵基副司令长官负责，督率各军务须阻止，切断敌军，如敌从某军正面逃走，即将其军长枪毙。”但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因在新墙河阻击战中已

经受到重创，而现在又遭到日军第3师团和掩护东侧侧翼的第四十师团，以及新近南下支援的第九独立旅团的南北夹击，福临铺很快失守。紧接着，日军第6师团也改道从福临铺附近逃跑。此后，中国军队实施超越追击，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但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于15日逃到新墙河以北，双方恢复原态势，会战结束。

此役据中方统计，日军伤23003人，亡33941人，被俘中队长以下官兵139人，中国军队伤16106人，亡11417人；而据日方的统计，中国军队亡28612人，被俘1065人，日军伤4412人，亡1591人。但不管孰对孰错，就双方的作战目的与结果而言，日军虽然达到了牵制中国军队策应香港作战的目的，但付出了惨重代价；中国军队虽然保住了湘北，并予敌以重大杀伤，但被迫放弃了进通广州的计划。应该说，各有得失。

空袭日本与浙赣战役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日军一时得手，罗斯福总统为了激励美国人的士气并规避新闻界的指责，在 1942 年春下了两招“闲棋”：一招是派声望正隆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由菲律宾赴澳大利亚，担任驻西南太平洋的美军司令官；另一招就是派 B—25 型轰炸机去轰炸东京和日本的其它城市。

1942 年 3 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制定了空袭日本的计划，其初步设想是利用 16 架经过改装的 B—25 双引擎陆军远程轰炸机从驶至日本东部海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对日本本土实行轰炸，完成任务后，再飞至中国东部浙江的机场降落。因这次行动的指挥它是杜立特中校，所以该部队又被叫作“杜立特部队”。在中国，为配合“杜立特部队”的行动，第三战区从 3 月底开始改建衢县、雨水、玉山等地的机场，分别将跑道加长到 700 多米或 1500 米，以便于像 B—25 这样的大型飞机起降。然而，中国在浙江东部扩建机场一事很快就被日军的侦察机发现，3 月 28 日和 29 日两天，日军出动飞机对这三处机场，进行了连续轰炸。

日军飞机对浙江机场的轰炸却引起美国军方的惊慌和

疑虑，于是决定将原定4月8日和9日的行动推迟。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军方见日军并无进一步的行动，才决定继续实施空袭日本的计划。4月18日，杜立特部队从距日本海岸700英里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出发，中午抵达日本东部时曾被日军设在水户北方的防空监视哨发现，但日军东部军原以为空袭时间是在19日晨，和几个月前美军在珍珠港犯的错误一样，没有发出空袭警报。12时15分，杜立特部队在东京上空投下了第一批炸弹，接着依次轰炸了横滨、川崎、横须贺、四日市、和歌山、神户以及新泻，直至15时15分，才从容地结束攻击，向西南方向飞去。当天14时30分，日军中国派遣军接到大本营的急电，称：“敌大型飞机空袭东京等地后有向中国方面退避模样。”于是派其所属的第一飞行团一面拦截，一面继续轰炸玉山、衢县和丽水三处机场。

就实际战果而言，杜立特部队空袭日本的行动确实有限，这次投下的只是4公斤重的爆破弹与1公斤重的烧夷弹，杀伤力不大，而且该部最后竟没有一架飞机找准航线，在燃油耗尽后都不得不强行着陆、弃机逃生。然而，这次行动却在心理上给予日本朝野以极大打击。日军大本营在当天的机密战争日志中记道：“去年今日，日美谈判开始之急电，使上层领导惊愕；本年今日，首都遭受空袭，上下震惊。”正因为此，日军大本营在4月21日即电令中国派遣军：“根据全面形势，务须火速实施炸毁浙江

省机场的作战。”

然而，此命令却让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颇感为难，因为以上海为中心的日军第十三军自4月上旬就计划在25日向宁国、广德之间突出部位的中国军队进攻，并已将其定为第19号作战。烟俊六认为与其花大力气从地面破坏飞机场，不如按原计划进攻杭州、芜湖一线的中国军队。但4月30日，日军大本营对烟俊六下达了最后的作战命令：“尽快开始作战，主要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根据地，遏止敌利用该方面空袭帝国本土之企图。”这样，烟俊六被迫放弃原定的第19号作战，不过，他在执行日军大本营命令的同时，也做了一点手脚，即一方面遵令以上海附近的第十三军进攻第三战区的东部，另一方面又暗地调汉口附近的第十一军进攻第三战区西部。因此，原定的浙江作战就扩大为浙赣作战。

这是1939年武汉会战以来中日双方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交锋。

蒋介石一直将第三战区视作减轻陕、湘压力，确保四川安全的重要一环，因此，第三次长沙会战甫一结束，他便将中国军队的精锐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与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由第九战区调往第三战区，以加强该方面的防务。

1942年再月中旬，第三战区长官部发现日军在杭州至奉化一线调动频繁，似有进攻金华、兰溪和衢州的意图，所以制定了一个以金华和兰溪为主战场的作战计划，其具体部署是“先以有力部队逐次在勾嵎山、安华、王沙溪市

及东阳、浦江、建德各线之既设阵地先予敌最严重打击，尔后诱敌于金、兰阵地前以主力由金华东北、西北合力围击而歼灭之。”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原以为日军的最后目标是攻占行县，所以做了上述安排。但他不知道以烟俊六为首的中国派遣军在私下里已经准备突破日军大本营原定的作战目标，4月24日，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在日记中写道：“第十三军，尤其自从我到任以来，始终以摧毁敌第三战区为目标。此次作战，大本营固然另有目的，但我准备利用此时机，实现原来目标……洞此，我决定本军将以歼灭第三战区之敌作为主要目的，占领飞行基地为决要目的指导此次作战。”

整个战役从5月中旬开始，到9月底才结束，历时4个多月，大致可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2年5月15日，日军在杭州至奉化一线发起进攻至5月28日，金华失守。

确切地说，日军在5月14日夜就开始了行动。先是日军第七十师团由奉化出台，但大部队如第二十二、第十五、第一一六和第三十三师团以及一个旅团都是在15日至17日分别从东关、绍兴、萧山、富阳附近开始行动。在正面第一道防线的中国军队是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下辖冯圣法的暂编第九军、何绍周的第八十八军和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按照预定计划，第十集团军的任务是逐次抵抗，将敌人吸引到位居浙中的金华、兰溪附近，然后，配

合主力部队将其歼灭。因此，与敌稍事接触，第十集团军即退至长乐、安华和桐庐一线，致使日军包围该集团军的计划落空。

但在这时，中国方面临时改变了作战计划。先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5月3日估计日军只有4万多人，无力进攻衡州，所以电请蒋介石允许他将了治磐的第二十六军与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东调，参加金、兰会战，但蒋不同意，相反，他提出了一个在行州附近决战的计划。因此，蒋不仅要求把第二十六和第七十四军继续留在浙赣交界处的戈阳、玉山一带，并且还要求原属第十集团军的第四十九军也调往密州方面。后来的战况证明，蒋介石避免在金、兰附近决战是正确的，因为加上从华北方面调来的援军，日军在浙赣线东段的兵力就已有6个精锐师团，共8万多人。而且日军这次是从余杭至奉化之间的正面呈扇形向金华与兰溪进攻，第三战区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在东北面截断日军的后路。但也正是由于这一变动，打乱了第三战区原来的战略部署，中国军队的机动能力与通讯能力远远不如日军，因此临时改变计划难免造成诸多混乱。到后来，顾祝同甚至无法了解各部队的具体情况，有些师明明已经因伤亡过大而丧失了战斗力，但他还是将其当做一个完整的师来使用。

由于改在扬州决战，金、兰方面的守军实际上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第十集团军本来准备在安华、义乌、长乐一线进行持久抵抗，这时也奉令改变计划，5月18